

# 归化、异化与读者反应

金 兵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河南洛阳 471003)

**摘 要:** 近年来, 归化与异化在翻译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有人提出翻译应当异化, 但也有人认为译文不可避免地要归化。这两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都忽视了对读者反应的考虑。读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译者既要使用归化法以迎合读者, 也要使用异化法以提高读者。重要的是译者一定要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以确保译作的最佳效果。

**关键词:** 归化; 异化; 读者反应

**中图分类号:** H32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2006)01-0042-09

归化与异化之争, 由来已久。佛经翻译时期的文质之争可视为这场争论的发端, 后来出现的直译与意译的二元对立一直持续了二千多年, 直到二十世纪末, 才出现了两个比直译/意译更加原则化的提法: 归化与异化。这对概念已经超出了纯粹的语言层面的问题, 而涉及到了文化、诗学乃至政治层面, 因而更加激起了研究者对它们的兴趣, 这从《中国翻译》近几年刊载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数量之多可见一斑。

目前比较公认的国内首次公开探讨这个问题的当属刘英凯<sup>[1]</sup>。1987 年, 他在《现代外语》上发表了《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 不过, 受当时翻译研究大环境的影响, 该文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1995 年, 由许钧在《文汇报》上发起的对《红与黑》译文的读者调查和讨论直接引发了归化派和异化派的交锋。此后, 2002 年, 《中国翻译》上又陆续刊载了四篇探讨该问题的文章。通过历时 10 多年的思考和辩论, 应该说目前对这两种翻译策略也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例如郭建中就认为, 归化与异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由于翻译目的、文本类型、作者意图以及目标读者的不同, 翻译策略的选择也不会相同, 两者将永远共存<sup>[2]</sup>。孙致礼更是在总结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学翻译的基础上, 大胆预言: “21 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 将进一步趋向异化译法。”<sup>[3]</sup>

然而, 理论上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立即能在实践中见到效果。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 目前国内尚无一部比较成功的、以异化法为主译出的作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呢? 笔者以为, 对于读者反应认识不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下面本文将就异化、归化与读者反应之间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 一、归化与异化的提出

在我国, 归化这一术语早在《三国志》中就已出现, 但由谁最早用于翻译研究尚不明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归化比异化用于翻译研究的时间稍早一些<sup>[2]</sup>。在异化出现之前, 归化的对立面

收稿日期: 2005-09-05

作者简介: 金兵(1976-), 男, 湖北随州人, 讲师, 在读博士生, 研究方向: 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是“欧化”，指在外译中的过程中，尽量保持原文的语言和文化特征。虽说我国早已有这样的提法，但时下论者讨论异化与归化，几乎不可避免地都要提到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提（Lawrence Venuti）。他在研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种翻译方法，第一种称为“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第二种称为“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异化法要求使原作者安居不动，尽量让读者靠近原作者。归化法则正好相反，译者应当使读者安居不动，尽量让原作者靠近读者<sup>[4]</sup>。具体到翻译实践中，归化法就是指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陌生感的翻译策略。而异化法则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策略。韦努提本人是主张异化翻译的，他认为欧美主流的翻译策略——归化法是种族中心主义的表现，而异化法则可以施加反种族主义的压力，具有把读者送到异域的作用<sup>[4]</sup>。

## 二、关于读者反应

历史上人们在论述翻译的时候，往往局限于谈论个人经验体会，很少会顾及读者，他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谋求译文对原文的忠实上。在西方当代翻译史上，第一个明确把读者因素纳入到翻译研究范畴的应属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Nida）。奈达翻译观的核心是动态对等和功能对等<sup>[5]</sup>，评价译本的优劣要看读者的反应是否与源语读者的反应大致相同。与以往仅仅进行译本和原文对照来评估翻译质量的做法相比，这一理论显然有它的高明之处。但是，由于读者的构成极为复杂，对读者的反应评估起来比较困难。因此，这一理论传入中国之后，喝彩声固然有之，对它的批评却也屡屡见诸报刊杂志。不过，根据张南峰的调查，很多对奈达提出批评意见的人似乎并没有弄明白奈达的真正意思，而且他们的评价里面掺杂了众多的价值判断<sup>[6]</sup>。有的论者在经过审慎的思考之后，指出读者反应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仍然有较强的现实意义<sup>[5]</sup>。笔者认为，这种评价是比较公允的。在当前翻译研究者就翻译策略问题进行辩论时，对读者反应进行重新思考显得尤为必要。

奈达因为读者反应论而受到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读者反应论会导致过度归化，从而导致译文失去源语文化中的几乎所有文化特色。但是，只要仔细研读一下等效论者的其它论述，我们就不难发现，等效论者从来没有说过纯粹以读者反应的好坏来评价译文<sup>[6]</sup>。事实上，等效论也是强调忠于原作的，只不过它更重视忠于原作的效果，而非字面意义。

译文读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因此要想衡量读者反应，一定要清楚译文的定位：它到底是针对哪一类读者。关于读者的分类，历史上也有多种提法。如傅斯年将译文读者分为普遍读者和学者；茅盾则将其分为一般读者和文艺学徒；鲁迅更是进行了细致的划分：“甲，有很受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sup>[5]</sup>这种分类在当时是很合适的，但已经不符合今天的状况了，因为当今国内大部分读者都处于甲类和乙类之间。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西奥多·萨瓦里（Theodore Savory）也对读者分析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将读者分为四类：（1）完全不懂原文语言的读者，他们阅读译作只是出于好奇或对原语文学的爱好；（2）正在学习原文语言的读者，他们阅读译作是为了更快更好地掌握原文语言，了解原语文学；（3）曾经学过原文语言但后来又忘记了的读者；（4）精通原文语言的读者<sup>[7]</sup>。应该说，这种分类方法运用到对当代中国读者的分析中还是比较适合的。目前构成国内翻译文学读者主体的是萨瓦里所指的第一类。

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就出现了一场关于谁最有资格评判译作感染力的争论。马休·阿诺德（Matthew Arnold）认为，评价译作的好坏，最有发言权的当属既懂得原文文字又能鉴赏诗文的学者，而不是毫无学识的一般读者。因此，译者必须重视专家学者的反应。而争论的另一方弗朗西斯·纽曼（Francis Newman）的观点则与之针锋相对，他认为，衡量译作的标准主要是一般读者而不是学者的反应，学者只能“审定作品的学识，而对于作品的意味则只有受过教育但无

学识的公众才有权评价”<sup>[7]</sup>。当时这场争论非常激烈，但最终也没有得出定论。时至今日，翻译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译作主要是给不懂外语的普通读者服务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照顾他们可能的反应。

我国古典名著《论语》在西方有两个影响比较大的译本，译者分别为亚瑟·威利(Arthur Waley)和托马斯·柯立瑞(Thomas Cleary)。柯立瑞的译本主要针对普通西方读者，而威利的译本则更适用于学者进行研究。由于两位译者紧扣目标读者的反应，因此他们的译本在各自的读者群里都得到了好评<sup>[8]</sup>。

### 三、翻译策略选择与读者反应

什么情况下使用异化译法，什么情况下又使用归化译法？这个复杂的问题恐怕绝非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的。有的论者也从总体原则上阐明了它们的使用范围，如孙致礼就曾指出，“可能时尽量异化，必要时尽管归化。”<sup>[9]</sup>但是，具体到实际翻译过程中，什么时候是可能，什么时候又是必要呢？这恐怕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韦努提自己也承认，异化翻译是一个主观的相对的(subjective and relative)概念<sup>[4]</sup>。不过一般说来，异化更加适用于文化的深层面，而归化则更多的体现在语言层面。“在翻译中，语言可以转换，甚至可以归化，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特别不宜归化，而要尽可能真实地传达出来。”<sup>[3]</sup>

必须注意的是，在文化特色的传译过程中，真正做到异化也是不容易的，特别是考虑到普通读者的情况之后，想做到异化翻译就更难。众所周知，目的语读者对于源语语言文化了解相对较少，这给他们阅读和欣赏造成了困难。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讲，就是读者与译作之间的审美距离过大。对于这种情况，译者当如何处理？是不是就完全应当遵循异化法，让读者感受到源文化的特异呢？我想，任何负责任的译者都不会这样做的。孙致礼在《翻译与叛逆》一文中探讨了李文俊在翻译《喧哗与骚动》时大量使用明晰化处理的做法<sup>[10]</sup>。以往有论者批评这种做法违反了忠实原则，但孙教授认为，如果李先生不这样做，中国读者根本无法看懂这本书，对于书中的意识流手法更是无从领会。毫无疑问，李先生所使用的明晰化手法当属于归化译法。孙教授将这种做法称为“关照性叛逆”，其实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读者意识。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始终把读者可能的反应放在心中。

在文字层面应该以归化为主，这在目前也是较好的做法。毕竟译本是要在目的语文化中生存，如果译本的语言过于背离译语语言规范，必然会造成读者的接受障碍。在大胆尝试异化法方面，韦努提可谓走得最远，但他也不得不接受一定程度的归化，“异化法毕竟是为了目的语文化而翻译原作的，它必须依赖居统治地位的的目的语价值观才能够显现出来。”<sup>[4]</sup>中国翻译界的异化法与韦努提的“异化法”有所不同，韦努提认为，译本既可以使用流畅的标准目标语，也可以使用不流畅的边缘话语；而目前国内的异化论者普遍认为，译本在求异的同时，应当尽量保持通达，以照顾读者的接受能力。

不过，异化论者也并非在语言文字层面一味保守，他们赞成尽量传达原作的异语语言形式。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尽量做到形似可以更好传达原作的内容，当然对于再现原作的风格也是大有好处的。什么情况下可以复制原作语言特征，什么情况是做不到的呢？译者要想做出正确的决定，就必须充分考虑读者可能的反应。如果复制原作的结果是文句不通，难以理解，那么只好采取变通措施了。如果仅仅是读着稍有不顺，但是仔细想想就能够明白则不妨大胆复制。鲁迅就认为，即使是对普通读者，“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言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sup>[11]</sup>

就异化法而言，尽量复制原文的语言特征是至关重要的，当前翻译界在这方面基本上还是趋

向保守的。中国译者受传统的影响，过于强调“顺”的作用，但是，适度的不顺不仅不会影响读者阅读理解，反而会给他们带来新奇的感受。韦努提在翻译意大利小说家塔西提（Ugo Tarchetti）作品的时候，就使用了一种既不符合英语规范，也不符合意大利语规范的语言。在西方，陀斯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两位英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大量使用不流畅的英文，他们的这种努力也得到读者好评<sup>[4]</sup>。

时下有些论者大声惊呼目前大陆翻译腔盛行，大有破坏汉语纯洁性之势。这其中自然有一定的夸大成分，但从他们的言论中，我们至少可以知道目前在各种译文中有些不太符合汉语规范的表达。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反应如此强烈呢？鲁迅在三十年代论述输入新的表现法的时候，就曾指出，“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的过去里。……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以‘不顺’而称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胜利。”<sup>[11]</sup>英国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其译论中也指出，异质成分进入目的语之后，可能会完全归化，也可能永远处于边缘地位<sup>[4]</sup>。可见，在引入外来语言特征的问题上，将评判权交给历史和读者未尝不是一个好方法，人为的提倡或者反对效果未必好。有论者就曾指出，“以……为手段”、“作为……”、“当……的时候”、“在……上、中、下、里、前、后”不符合汉语规范，翻译中不能用。<sup>[12]</sup>可事实上，随便翻翻时下国内任何一部译作，找出那些受到批评的表达方式并非难事，而读者对这些表达方式也早已见怪不怪了。

很多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会过低地估计读者和目的语的容忍度，因此在本来可以使用异化法的地方采用了归化法。众所周知，汉语虽然历史悠久，但现在通行的白话文历史并不长，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算起也不到区区百年。在白话文的发展过程中，外来语言结构的输入产生重大的影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语言上的适度异化是必须的。“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据为己有。”<sup>[11]</sup>那么读者对于异化法翻译出来的作品到底又是什么态度呢？参阅一下1995年那场关于《红与黑》各译本的大讨论便可知，大部分读者对使用异化法翻译的句子还是有相当的容忍度的。

#### 四、读者反应的演变与翻译策略的选择

读者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群体，读者的接受能力也随时代发展而产生变化，读者反应的这种特性决定了翻译策略也应该与时俱进。从大的历史层面上看，从晚清以来，中国的文学翻译在策略上从以归化为主逐渐转向以异化为主<sup>[3]</sup>。具体到一部作品的翻译，大体上也能看到这种演进的痕迹。较早出现的译本，往往更注重介绍原作的思想内容，同时为了照顾读者的理解，大量采用归化译法。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读者对作品以及外国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后来的译者完全可以更多的采用异化译法。前译采用较多的明晰化、同化处理，后译则更倾向于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特色。在著名翻译家傅雷译的《邦斯舅舅》中，有一处引起争议的译文<sup>[5]</sup>。

Ce vaste visage perce comme une ecumoire.

1. 阔大的麻子脸象个脚炉盖。（傅雷译）
2. 阔大的脸麻麻点点，象只漏勺。（许钧译）

许钧认为傅雷的翻译失去了自然，不如保留原形象为好。不过，在傅雷的时代，金属制的漏勺还没有进入普通百姓家。傅雷为了照顾当时读者，将它替换成老百姓比较熟悉的脚炉盖自然是有道理的。时至今日，时代变了，读者的情况也发生变化，相比之下，许译显然更能为读者接受。

正是由于读者反应呈现动态变化，才使得复译有了必要。当然，由于不同译者对翻译原则的

认识不尽相同,后来的译本未必比前译的异化程度高。事实上,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绝大多数译者是采用归化译法的。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的更加开放,随着读者对外国文化的了解进一步深入,随着译者对翻译策略认识的提高,在 21 世纪必将出现较多的采用异化法译出的作品。

在读者这方面,为了欣赏译作,也必须付出一定的努力。读者不能指望译本和汉语原作一样好懂(何况有的汉语原作也是很难懂的),这在阅读理论书的时候尤其如此。“要求什么译本都翻开第一行就懂的译者,却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sup>[11]</sup>要正确理解汉语作品已经需要相当的文化水平和知识积累,而译作所反映的社会文化情景和中国的差别很大,读者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读者可以通过翻译文学之外的各种途径了解国外文化,增长见识。同时,他也应当注意提高自己的汉语修养,这无论是对于欣赏译本还是评判译本都是大有好处的。在当前提倡异化法的大背景下,读者更需要做好心理准备,敞开心怀迎接译作里面可能出现的异样表达、奇怪的风俗和思想观念。有的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经常会舍弃原文中的一些变异之处。他们担心中国读者会无法接受这样的变异,其实,读者阅读外国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体会异国情调之异,因此在阅读过程有着同阅读本土文学不同的审美期待。

目前国内的异化论者在主张异化译法的同时,也强调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异化也不宜操之过急,而要稳扎稳打,与时俱进。”<sup>[12]</sup>这个提法可以说充分考虑到了当前中国读者的实际状况,多年来,读者已经适应了阅读使用归化法翻译的作品,要转变他们的观念需要一个过程。历史上就有一些倡导异化翻译法的译者未能得到读者的认可,甚至受到严厉批评,如庞德(Ezra Pound)的翻译,鲁迅的翻译。韦努提也尝试过用异化法翻译意大利小说家塔西提的作品,虽然也得到了好评,但更多的则是批评意见<sup>[14]</sup>。

从当前来看,归化向异化转变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应当把握“适度”的原则。在翻译实践中,也确实有些以异化为主,但同时也结合归化的佳作。如下例:

April is the cruelest month, breeding

Lilacs out of the dead land, mixing

Memory and desire, stirring

Dull roots with spring rain.

Winter kept us warm, covering

Earth in forgetful snow, feeding

A little life with dried tubers. (T. S. Eliot: *The Waste Land*)

我们来看下面两种译法:

四月最残忍,从死了的/土地滋生丁香,混杂着/回忆和欲望,让春雨/跳动着呆钝的根。/冬天保我们温暖,把大地/埋在忘怀的雪里,使干了的/球茎得一点点生命。(查良铮译)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冬天使我们温暖,大地/给助人遗忘的雪覆盖着,又叫/枯干的球根提供少许生命。

(赵罗黎译)

上面二位译者都是国内译坛上的顶尖翻译家,但他们笔下的译文风格却差别很大。查先生的译文异化倾向非常明显,尤其“滋生”、“混杂”、“跳动”等几个动词的使用,显得非常新颖。此外,“冬天……把大地埋在忘怀的雪里”的说法也颇具新意。相比之下,赵先生的译文就稍显保守,更多地照顾了汉语的规范。著名作家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一文中特别提到了两位对他影响至深的翻译家,其中一位就是查良铮。笔者认为,正是查先生较多地运用了异化法,使得译文对读者极具新鲜感,但与此同时,他的译文也绝非那种磕磕巴巴、令人不堪卒读的译文。可以说,

查先生很好地把握了归化与异化的度。

## 五、结语

关于翻译策略的探讨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但笔者认为,脱离了读者来讨论归化和异化是有失偏颇的。读者可能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译者的翻译策略;反之,译者一旦确定使用某种翻译策略,就会对读者提出一定的要求。当前理论界已经就翻译策略基本上取得了共识,但真正异化翻译作品的成功取决于译者和读者的共同努力。译者要更加信任读者的能力,通过异化不断增加读者对异国语言文化的了解;读者也不应简单地将阅读翻译文学当成一种娱乐消遣,而是当作一种学习思考活动,在平时就注意积累阅读翻译文学所必须的语言文化知识。

### 参考文献

- [1] 王东风. 归化与异化: 矛与盾的交锋? [J]. 中国翻译, 2002, 23(5): 24-26
- [2] 刘艳丽, 杨自俭. 也谈“归化”与“异化”[J]. 中国翻译, 2002, 23(6): 20-24
- [3] 孙致礼. 中国的文学翻译: 从归化趋向异化[J]. 中国翻译, 2002, 23(1): 40-44
- [4]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Practic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5] 秦洪武. 论读者反应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的意义[J]. 外国语, 1999, 22(1): 48-54
- [6] 张南峰. 从奈达等效原则的接受看中国译论研究中的价值判断[J]. 外国语, 1999, 22(5): 44-51
- [7]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8] 崔永禄. *文学翻译佳作对比赏析*[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
- [9] 孙致礼. *翻译: 理论与实践探索*[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 [10] 孙致礼. 翻译与叛逆[J]. 中国翻译, 2001, 22(4): 18-22
- [11]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修订本.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12] 思果. *翻译新究*[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 and Reader Response

JIN Bing

(English Department,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Luoyang, China 471003)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heated debate centering on the use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Some translators prefer foreignization while others hold the idea that domestication is inevitable in the translating process. Both of them fail to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reader response. Reader is a dynamic concept. In the translating process, translators should not only use the domesticating method to cater for readers' expectations, but also the foreignizing method to help improve readers. After all, translators must make an attempt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wo methods so as to ensure the effects of the translation.

**Key words:**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 Reader response